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八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四七期 ——  
(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1a)

---

【艰难岁月】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中)	丁凯文
【人物春秋】陈毅发表一篇特殊演讲始末	涂生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艰难岁月】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中)

• 丁凯文 •

九、军内造反派势力是如何被遏制的？

1966年8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吴法宪回忆说“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1966年10月中央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发出后，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吴法宪回忆说“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事如何“闹革命”的呢？吴回忆说“从1966年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驻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

轰、火烧、并且抢劫档案，肆无忌惮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事实上，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如何有效地制止这股来自军队内部的造反势力则成了林彪等人必须考虑并应对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实现这个目标竟然是一个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笔者认为研究者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1967年5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5月13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感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5月23日“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6月9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成为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林彪此举值得称道。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总政主任萧华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萧华本人在演出前不同意“老三军”一派的演出，出现事端后又单方面指责“演出派”。本来“演出派”是保护萧华的，如此一来引起“演出派”对萧华的强烈不满，结果无论是“老三军”还是“新三军”都反对萧华。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

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吴总结说“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事实证明，萧华的倒台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已。至于萧华在军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么错误，吴法宪含混未提。据笔者所了解，萧华虽然躲在西山，但个人生活却极不检点，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萧华的倒台，要怪也只好怪萧华自己了。

## 十、中央专案组内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一个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则是中央专案组。前者已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问世，人们对其知之较详，但是后者的资料却非常少，世人对此机构虽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只有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错案的老干部们平反时，才稍有披露，但是当局对其中之详情仍然讳莫如深。个中之缘由不难猜测，其内情实在见不得阳光，如照实情披露出来太过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自己的“光辉形象”。然而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各种史实还是会不断透露出来。吴法宪将军由于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此有相当的了解，亦颇有披露。笔者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1）文革期间专案组多如牛毛。吴法宪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2）吴法宪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个专案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吴法宪回忆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3）中央专案组的组成：中央专案组共有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下属七个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下设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下属四个专案组：“五一六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4）中央专案组的组织形式：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比如：“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陈伯达，主管陆定一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案的是江青。中央“二办”主管彭德怀案的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主管贺龙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办”的各个专案皆由谢富治主管。

（5）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形式：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会议常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每次会议都是如此。

（6）专案组办案的最关键的要害在于，受专案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

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吴法宪回忆说“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帮”后给几乎所有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并指出他们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但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举出了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1970年9月17日。黄永胜则在11月3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将军最后这句话质问得好！为什么邓小平不敢追究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搞政治迫害的责任？为什么要嫁祸黄永胜等人？彭德怀是在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的，那时林彪早已横死蒙古沙漠多年，黄永胜也被毛泽东关押审查，如果彭德怀真是林黄等人搞的冤案，为何毛泽东周恩来不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我们进一步追问，彭德怀去世时，正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之际，邓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还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这一逻辑，邓小平也是党政军内的当权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邓小平也参与了迫害彭德怀的活动，邓小平难道就不须为彭德怀之死一事负责吗？！

## 十一、“上海带人”之内幕

文革期间，吴法宪作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可有时却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记得当年“两案”审判时，当局就指控吴法宪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关江青的资料，还曾经将有关人等带到北京。笔者几年前就曾质疑过此事：如果没有更高一层的授意，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有什么权力到上海“抓人”？读了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心中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

由于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颇有一些“绯闻”，1968年春，上海地区的红卫兵曾收集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印成小册子，在市内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后认为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周恩来予以处理。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求吴法宪去办，理由是吴有飞机，来去方便。吴本来不愿去，借口对上海不熟悉，但是陈伯达却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吴回忆说“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

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吴法宪领受任务到了上海后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体问题由张来办，不论张春桥交来什么，吴本人只是负责将有关人等和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吴回忆说“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黄赤波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笔者注）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另外，江青本人还单独交代吴法宪将上海的作家孙峻青带到北京，并不许将此事告诉张春桥，然而孙峻青一被带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吴法宪一直不清楚江青为何要抓孙某人，为何不要张春桥知悉此事。

显然，吴法宪去上海执行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是直接奉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江青个人的私利，周恩来毫无原则地纵容、逢迎江青的无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职权充分满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江青一句话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和作家等人，从而又一次制造了冤案，联系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如此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有何脸面和资格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有这么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40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发生在1966年10月的这一幕与两年后发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缴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而1968年的行动却更甚以往，不仅仅是搜查资料，干脆下手抓人了。1968年江青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江青在1966年10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之家一事难道就没有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江腾蛟只奉了叶群的指示就敢于命令军人执行抄家任务？其背后怎么可能没有更高一层的确认、批准？吴法宪不是1966年事件的执行人，未必知晓其中之内幕，但是我们有理由对中共单方面的说辞予以质疑，笔者相信该事件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 十二、“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

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1）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1967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2）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1967（1966年？）年11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1967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3）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4）1967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5）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6）1968年3月23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

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后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7）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3月23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8）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9）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1）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2）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3）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如果仅仅是儿女情长产生的矛盾，将有关人等调开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追问，军委办事组内部存在着矛盾，只是这一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爱将，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伙”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杨成武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只有搞清杨成武的所作所为才能解释此一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分裂

由于中共官方多年的宣传，人们一提起林彪和江青，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话来说，就是：林江在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分赃上才有了矛盾。这种提法为日后“两案”的审判定下了基调，也成为当局多年来任意曲解文革史的准则。以笔者目力所及，大陆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学者以及一些多少有点自己观点的非官方史学研究者都很难跳出这个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狭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资料，往往出现一些闭门造车、隔靴搔痒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科研成果”。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也就无法解释为何后来出现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和“9 1 3 事件”的发生，这绝不是所谓“分赃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着异常深刻的背景，探讨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历史深层的内涵。

对于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吴法宪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线索。笔者现作如下归纳：

（1）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荼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

（2）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3）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黄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也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的某种程度的得逞。鉴于温玉成的转变，林彪日后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任职。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4）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认为“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上海帮”的一个重要因素。



（5）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

（6）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还有其他一些事例，这里无法一一详述。笔者只是想指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面对这些挑衅，林彪不愿像周恩来那样忍气吞声，唾面自干，而是要作出适当的反应，要对江青等人的破坏中央工作的活动予以批评，对他们的为所欲为要有所制约，这才是斗争的实质所在。

#### 十四、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笔者曾经写过专文，发表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题目是《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对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作了分析和探讨。今年明镜出版社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感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林彪在是否讲话问题上有过反复。多年来官方的喉舌们都是众口一词：林彪在会上搞突然袭击，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争得了毛泽东的许可，毛还叮嘱林说，可以讲话，但不要点名。但是吴法宪回忆说会前曾去看望林彪，叶群对吴说“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吴在林彪处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计划好了打击“上海帮”，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及时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一些风声，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吴法宪等人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吴法宪回忆说当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由林彪讲话时，吴法宪的感觉是“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为什么林彪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是林彪自己会前临

时改变了主意，还是听了其他人的建议而出面讲话？

（2）谁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来越清晰。汪东兴在九大前后就已倒向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异常密切，毛泽东的谈话甚至私情都向林彪这边透露，在打击张春桥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汪东兴都积极参与，并在会上会下活动频繁，这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是出自汪东兴之口，汪在华北组讨论时更是高调支持林彪讲话，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同时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会议的第二天，吴法宪只是建议讨论林彪的讲话，可是汪东兴却建议与会代表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唯恐与会者听不出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没有汪东兴的积极活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倒张（春桥）活动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3）康生的追查与周恩来的保林。8月26日和27日康生连续两天找军委办事组谈话，康生要追查“军事俱乐部”，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否认康生的指控，周恩来则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为了保护林彪，周恩来要吴法宪主动写检讨，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林彪告诉吴说康生和周恩来都到林彪处，康生指责吴法宪造谣，而林则坚决保吴，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林彪甚至不同意吴作检讨，并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还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但是由于有周恩来的作用，吴法宪还是写了一个简单的检讨。

（4）是陈伯达威信太高还是林彪威信太高？8月31日毛泽东指示全会开始批陈伯达，毛泽东说：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全会由此开始批陈，“上海帮”齐上阵，对陈伯达狠揭狠批，随后陈伯达就失去了自由。毛泽东此时借所谓批陈达到杀鸡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说“陈伯达威信太高”，实际上是说“林彪威信太高”。吴法宪回忆说“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 十五、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引发了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忽然发现林彪在搞文革一事上竟然不与自己一条心，林彪竟然在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打击、清除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心头爱将——张春桥，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一直对准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毛泽东不铲除林彪势力绝不罢休。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他的亲身经历。

（1）继续审查不停止。1970年9月7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陆续下了山，但是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并未放松追查。周恩来与康生奉毛泽东指示在9月9日和12日两次召集黄吴李邱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上的问题。康生不改其搞专案的风格和特色，一上来就指责黄吴李邱“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把自己

解脱得干干净净，周对吴法宪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但是吴法宪当场揭了周的老底，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赞同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对此很不高兴。黄吴李邱异口同声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活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康的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极不满意的。

（2）毛泽东拒见吴法宪。毛泽东为了在军委办事组内打开突破口，曾在1970年国庆节前约见林彪一次。林彪事后将吴找到家里对吴谈及此次毛林的谈话大致内容。显然，毛泽东在考虑“换人”，而林彪则是力保吴法宪。林彪对毛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林彪因此建议吴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林彪对吴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可是吴法宪三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见面都被毛泽东拒绝。吴法宪回忆说“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3）毛泽东逼迫军委办事组作检讨。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最为严厉。黄吴李邱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4）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急招黄永胜上山，就意图拉黄反戈一击，但是黄永胜不为所动，毛泽东大为失望。11月13日毛泽东批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其后的华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举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此二人成为庐山会议后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级干部。

（5）军委扩大会议不得不批陈。1971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原本是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却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死老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压军委办事组公开检讨。军委办事组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会回家的军队干部连夜开会作检讨。

（6）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态度。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并未露面。几个老帅如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都没有批军委办事组，但是吴法宪所在的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搞批张，引起轰动，吴法宪受到围攻。黄永胜当即电告叶群，当晚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叶群在第二天与会，周恩来则不愿事态扩大，对吴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吴法宪认为，林彪之所以选在此时回京，就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在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态度就是不讲话，不作检讨，周恩来曾对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林彪有没有在私下或其他场合反毛呢？吴法宪回忆说“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知道了。”

总的来看，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被毛泽东穷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9 1 3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 十六、毛泽东的南巡和吴法宪的醒悟

关于毛泽东的南巡，笔者曾撰文专门予以探讨——《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网友们如有兴趣可去本坛（“林彪、军队、文革”）本人文集阅读。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示。

吴法宪将军多年后对此有极深的感悟，笔者愿在此原文照录：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将军从十五岁起就提着脑袋跟着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若干年后能有此醒悟，难得啊！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使他们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

### 十七、“9 1 3 事件”一些情节

关于“9 1 3 事件”，现在已有很多文章和书籍予以讨论，最新出版的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有极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来此书一读。笔者读了吴将军回忆录，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1）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 2 5 6 号飞机？林立果一行在 1 9 7 1 年 9 月 1 2 日晚乘三叉戟 2 5 6 号飞机从北京飞抵北戴河，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吴法宪对此一无所知。当周恩来电话查问飞机一事时，吴说绝对没有调过飞机，随后吴查到专管专机任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胡萍回答说专机去北戴河是因为改装后的试飞，吴随即命令该机立即调回北京。显然，吴法宪并未调动过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下令飞机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胡萍是私调飞机还是循正常途径调 2 5 6 号飞机？胡萍自己的申辩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胡萍还说“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由此可见，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专机符合正常途径，至于林彪一家想逃亡并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萍与林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周恩来、吴法宪等人命令 2 5 6 飞机立即飞返北京，没有得到严格贯彻和执行，“县官不如现管”，潘景寅则颇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2）叶群和周恩来，谁先主动打的电话？对于“9 1 3 事件”的回顾，当事人往往各说各话，致使一些问题众说纷纭。汪东兴的回忆说“晚上 1 1 点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而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回忆则说“当晚 2 3 点 3 0 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电话”。那么叶群和周恩来到底是谁给谁打电话呢？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

周恩来还叮嘱吴说“可能她（指叶群——笔者注）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笔者从另一位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与吴法宪所说相同，即电话是叶群先打给周恩来的。叶群在临要逃亡之际，为何主动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吗？这其实说明了叶群并不知道他们的逃跑计划已泄露，而林家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中央的控制之下了。

（3）256号机长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913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256飞机副驾驶员康庭梓的叙述，潘景寅是有意制造了机组人员4走5留的局面。详情可见本坛康先生大作：《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在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党，潘景寅故意只叫醒了三位机械师上机，而留下了领航员、副驾驶和服务员睡觉，致使他们赶不上登机，最后潘自己一人独自驾机升空，完成了“抢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务”，只是这一奋不顾身的抢救不仅未能救副统帅一家，反而全机人员命丧蒙古沙丘，令人唏嘘不已。吴法宪曾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而潘景寅在电话中也满口答应。但是飞机还是在潘景寅的驾驶下升空了。潘为何敢于违抗空军司令的命令？其背后还有无其他人所不知的内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么样的关系等还需再作深入探讨。

（4）吴法宪在“913事件”中有无失职？应该说吴法宪在此一突发事件中一直是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职问题。张耀祠在其回忆中说“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张耀祠显然还是先入为主地将吴法宪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而戴着有色眼镜歪曲了事实。从周恩来第一次给吴打电话起，吴法宪一直忠于自己的职守，追查256号专机是如何去的北戴河，并直接命令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不可起飞。待256飞机飞抵赤峰附近时，吴还建议是否派赤峰地区的歼击机部队予以拦截，但是周答复吴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汪东兴回忆说，这是汪向吴作的传达，汪说“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此外，吴法宪还向下属传达了周恩来的禁航令。尽管吴法宪坚决执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来还是派自己的亲信杨德中赶到西郊机场。吴法宪回忆说“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913事件”是一个突发性事件，这之前人们根本意识不到林彪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会乘机出走。细究此事的发生，根源于毛林二人之间的矛盾。从毛泽东这方面来看，毛泽东要坚决维护自己拼了后半生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要铲除那些异己份子，无论谁反对文革或起到阻碍作用，毛泽东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废黜打倒，林彪正是因为成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新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才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终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从林彪这一方面来看，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林彪全无招架抵挡的可能，当初林彪将毛泽东吹捧上了天，号称“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权，也绝无可能公开扯旗造毛泽东的反，更何况林彪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情谊。与此同时，林彪自己亦有极为鲜明的个性，林彪绝不低头作贱自己，绝不会像周恩来那样无数次检讨自己、唾面自干，自打嘴巴，这种刚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压和逼迫，林彪宁可选择与毛泽东和平分手。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下台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选项之一，只是林彪的这一走代价实在太太大，其结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泽东也绝非真正的胜利者，“913事件”之后毛氏文革从此亦走入穷途末路，也种下了江青等“四人帮”在毛死后彻底覆灭的因子。

（未完待续）  
~~~~~

## 【人物春秋】

### 陈毅发表一篇特殊演讲始末

• 滌 生 •

陈毅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他是老师中态度比较明朗的一个，也是较早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极“左”做法进行抵制和斗争的一个。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这篇演讲在当时可以说是语出惊人，犹如在中国的政坛引爆了一颗炸弹，产生了强烈的震动。

#### ◇ 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

陈毅是一个胸怀坦荡，直言快语的人。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他曾向毛泽东讲过自己的担心，向周恩来讲过自己不理解“文革”一些做法的心里话，甚至他直接当着红卫兵的面，说自己对“文革”不理解。陈毅的公开表示，令毛泽东很不满意，但毛泽东知道陈毅是个光明正大的人，也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所以即便如此，毛泽东对陈毅还是信任的。在“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毛泽东认为可以批评一下陈毅，但绝对不赞成打倒陈毅，而且在“文革”初期，还继续让陈毅当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主持外事工作。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陈毅和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由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在会上，陈毅和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人一起，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搞乱全党全国的行径进行了指责，对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但事后，毛泽东却严厉批评了参加会议的老师和各位副总理。特别是张春桥等人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一些挑拨的话，加重了毛泽东对陈毅的不满，使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更加不好。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子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他在讲话中还煽动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还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造反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出有多少过火的地方。”王力的话，煽动性极大。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也给陈毅出了很大的难题。

但是，陈毅从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稳定国家外交工作的大局，绝不交权。这就使林彪、江青等人“很不舒服”，决心一定要打倒陈毅。他们组织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和外部的红卫兵，集中火力，攻击陈毅。陈毅成了在外交部被批斗的主要人物。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

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 ◇ 《我这个外交部长》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发表这篇演讲时，红卫兵给他录了音，陈毅身边工作人员也录了音，因此，陈毅讲完之后，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比较完整地整理出了陈毅的演讲内容。档案中现在仍然保存着这份由他身边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陈毅的演讲稿。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打倒大军阀



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 ◇ 被歪曲、篡改

陈毅的这个演讲。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是直接批“文革”中极“左”做法的一篇痛快淋漓的演讲，同时也是一份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宣言，揭露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本质。自然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极大仇视。

陈毅的演讲稿被红卫兵记下来后，传到中央“文革”。江青先看了，她气得脸发白，认定这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时，她也认为这是一个“大毒草”，现在，有红卫兵的记录稿，正好可以借此打倒陈毅。于是，江青把陈毅演讲记录稿送给毛泽东。江青以为毛泽东会和她一样发怒的，毛泽东一发怒，就会同意打倒陈毅。出乎江青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后，笑了笑，并没有表态。

林彪也得到了陈毅讲话的记录稿，对陈毅讲话内容也十分不满。特别是陈毅提到林彪曾经是他的部下，“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毛主席），很伟大嘛！”。林彪觉得，这是对他权威的一个鄙视，因此他指使吴法宪，和中央“文革”联系，要把陈毅从建国以来发表的一些讲话，搞一个摘编，作为打倒陈毅的材料，还让吴法宪在军队一定范围里批陈毅。江青、张春桥得知林彪的意见后，十分高兴。江青让张春桥具体落实这件事情。张春桥经过考虑后，决定在上海搞陈毅的材料，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王洪文和徐景贤。王洪文和徐景贤立即组织人，把陈毅从建国初期到1966年的讲话都收集来，然后加以断章取义，搞一个摘编。

但是，毛泽东一直不同意打倒陈毅。没有毛泽东的话，江青等人不敢造次。于是，他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陈毅的演讲通过红卫兵小报传出去。当时，全国到处都有红卫兵小报。这些小报，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油印的，上面刊登的内容，大多是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讲话、红卫兵的“战斗情况”、还有需要打倒的人的罪状。其中许多都是造谣之作。当时红卫兵小报无论怎样造谣，都不负法律责任，没有人来追究。中央“文革”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利用红卫兵小报，搞了不少的鬼，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不少好干部。江青想到用红卫兵小报把陈毅的演讲捅出去，可谓用心险恶。

不久，红卫兵小报上便刊登了被他们刻意篡改了的演讲。他们把陈毅演讲的完整内容割裂开来，断章取义，给人一种陈毅反对毛主席的错觉。这种红卫兵小报，散发于全国，立即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在这种气氛下，首先是北京的红卫兵组织，跑到外交部，非要揪出陈毅，把陈毅“千刀万剐”不可。红卫兵还向全国各地发出通令，外地的红卫兵组织也来到北京，和首都红卫兵“会师”，专门揪陈毅。一时间，外交部被红卫兵包围得水泄不通。红卫兵还和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内外联系，共同向陈毅发难。

陈毅也知道了这种形势。他十分沉静。他自己在演讲时早就说了我“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他照样吃饭、睡觉，照样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照样进中南海见毛泽东，向他汇报外交工作。一次，毛泽东主动问起说，听说有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组织要揪斗你，是这样吗？陈毅坦诚地回答：是这样。毛泽东说，揪斗你，你怎么办？陈毅问：你认为我是不是好同志。毛泽东答：当然是好同志。陈毅立即把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本拿出来，请毛泽东把这句话写在最后一页上。还说：有你这句话，他们就打不倒我啦。果然，在后来，红卫兵要揪斗陈毅时，陈毅把《毛主席语录》本亮了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把毛泽东写的这句话念给红卫兵们听，红卫兵们一见是毛主席亲笔所写，就不敢提打倒陈毅了。

原来，毛泽东虽然对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但他认为陈毅是个直言快语的人。陈毅在过去的革命历史上，长期与毛泽东共事，毛泽东了解陈毅，知道陈毅对党忠心耿耿，是个好同志。他同意红卫兵批陈毅，但不同意打倒陈毅。

#### ◇ 当选“右派九大代表”

1978年底，中央决定在第二年召开九大，各地开始推举九大代表。九大的筹备工作，是在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插手下进行的。目睹全国被搞乱，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而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却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弹冠相庆，陈毅十分气愤。同时，对江青等人抓住所谓“二月逆流”，在1967年大加批判还不够，又于1968年春天继续批判“二月逆流翻案风”，陈毅十分不满，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我不当九大代表，我受过许多批判，不够格！毛泽东听后说：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毛泽东一向和陈毅无拘无束地谈话，二人经常开玩笑。陈毅和毛泽东谈到当九大代表这件事时，毛泽东说过一句玩笑话：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不久，康生搞了一个拟议的九大中央委员名单，康生在这个

名单中，没有列入陈毅的名字，毛泽东提出意见：还是要把陈毅列入。

一直对陈毅发表那篇演讲耿耿于怀的张春桥，本想把陈毅排斥在九大代表之外，但毛泽东的基本意见是让陈毅当九大代表，还要当中央委员，张春桥等人不得不把陈毅列入九大代表之列。但张春桥猜测毛泽东的心理，是既不同意陈毅的那篇演讲，又要保陈毅，因此，玩笑话也包含一定内容。于是，他就利用毛泽东和陈毅开的这句玩笑话，大做文章。按当时规定，推举九大代表，陈毅应该是由上海推举。张春桥又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告诉了上海的王洪文、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上海的王、徐二人心领神会。不久，他们搞了一份给陈毅的公函，公函中写道：遵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上海市的党员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随公函还寄去了履历表。公函上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印。陈毅看后，知道是张春桥等人捣鬼，哈哈一笑，坦荡地填写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张春桥等人见陈毅根本不在乎，不发怒，也不理睬他们，就进一步捣鬼，在九大之前，在上海和南方一些九大代表中造舆论说：陈毅是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的。这样，陈毅就戴着这项“右派代表”的帽子，出席九大。

在党的九大上，江青、张春桥等人仍然抓住陈毅的这篇演讲不放，对陈毅大加批评，组织人对陈毅进行围攻。

九大召开时，陈毅自然被分到华东组，陈毅又是上海市推举的九大代表，要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在小组讨论会的第一天，陈毅坦荡地走进会场，微笑着和出席九大的上海代表打招呼。但会场上，多数人不敢看他，在回避着陈毅的目光，只有几个老熟人上前和陈毅握手。敏锐的陈毅马上断定，张春桥他们又在捣鬼了。果然，还没等陈毅坐下，徐景贤突然领头高喊口号：“打倒陈毅！”，“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陈毅回头看了看徐景贤，从容不迫地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烟，把手中拿的会议材料慢慢地打开，抬起头，用炯炯有神的双眼，扫视了一下会场，用沉稳的语气说：各位同志，当选九大代表的标准共有七条，有四条是毛主席在关于接班人标准中早就讲了的，有三条是林副主席讲的干部标准。我陈毅不够这些标准，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王洪文立即跳了起来，他抓住陈毅语词中所说的“上海党”这句话，说：陈毅这样讲，是分裂中国共产党。接着，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开始批陈毅。王洪文第一个发言，他打开他们编的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念一段陈毅的话后，批一阵。陈毅觉得有点不对头，为什么他们手中拿的材料我手里没有？但是，陈毅也不问，他心中已经有数，他们手里拿的，肯定是他们搞的黑材料，于是他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王洪文发言之后，徐景贤接着发言，也是念一段材料上的话批一阵。讨论九大文件的会议，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批判者特别抓住陈毅那篇演讲，无限上纲。对此，陈毅只是微微一笑，他对这些人的做法，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一个一个发言结束后，也不让陈毅说话，在那个场合下，陈毅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这次批判陈毅的会议，一直开了两个多小时，王洪文这才宣布会议告一段落。批判之后，王洪文这才装模作样地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虽然“四人帮”一伙人处心积虑地整陈毅，但毛泽东还是要保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与陈毅之间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毛泽东的意见是仍然让陈毅当九大主席团成员，仍然选他当中央委员。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陈毅当上了九大主席团成员，也在九大选举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这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他从这件事情上进

一步认识到陈毅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认识到陈毅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陈毅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在一次会议上揭发批判了林彪的罪行，毛泽东看了陈毅的发言记录稿，对陈毅的观点十分赞赏。

1972年，陈毅逝世。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沉痛。他不顾自己身体不好和工作人员的劝阻，坚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再次肯定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的行动和讲话，就等于是为陈毅发表这篇著名演讲而受到批判、围攻等不公平待遇平了反。

□ 《党史纵横》 2006年第8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